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促进湖北经济发展

——2009 年湖北金融高层论坛学术观点综述

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

(湖北经济学院, 湖北武汉430205)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 (2009) 04—0128—02

2009 年5 月16~17 日, 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促进湖北经济发展” 为主题的2009 年湖北金融高层论坛在湖北经济学院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湖北经济学院主办, 由湖北经济学院金融学院、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社科院、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科技学院、湖北经济学院等多所院校和研究机构的10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共湖北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博士生导师赵凌云教授到会并致词,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李杨教授作了题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救助及影响》的主题报告。与会专家围绕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影响等理论问题和金融危机对湖北经济金融的影响与应对策略等实际问题展开了自由而热烈的研讨。

一、全球金融危机的理论思考

始于2007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 不断演化升级, 2008 年9 月15 日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与会专家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救助、影响与其反思展开了充分的交流与对话。

(一) 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李杨教授通过对当前金融机构的困境、全球股市的重创、国际汇市的宽幅震荡、流动性极度紧张等现象的分析, 指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一是美国实体经济增长停滞; 二是美国特有的赤字经济; 三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疏远化”; 四是货币政策推波助澜; 五是美元霸权延缓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武汉大学黄宪教授认为, 目前对这场罕见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研究中, 有一个重要的诱发和加速因素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 and 关注, 它就是“巴塞尔协议”指引下的资本监管模式。巴塞尔协议引发了三个效应, 即“监管套利效应”、“信贷紧缩效应”和“亲经济周期效应”的合力, 在客观上成为金融危机诱发主因之一, 并促使金融危机加速传导至实体经济。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教授认为, 2000~2001 年美国网络股泡沫后, 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 只得用房地产市场刺激美国经济增长, 采取低利率政策, 由此拉开了“次贷”危机的序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宋清华教授认为,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创新, 源于金融创新导致的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华中科技大学蓝寿荣教授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投资银行家的贪婪、欺诈, 衍生金融工具仅是投资银行家手中的道具。湖北经济学院刘宁博士通过介绍美国国际集团(AIG)在此次危机中的表现, 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对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以及管制缺位。

(二) 金融危机的救助

李杨教授指出, 杠杆效用在金融领域是普遍存在的, 但是如果杠杆化作用被滥用, 杠杆率无限制地提高, 便会酿成金融危

机。危机的解救是“去杠杆化”，并且只有央行和政府财政提供资金才是金融危机救助过程中降低“去杠杆化”风险的唯一路径，但此过程却是痛苦而又漫长的。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教授认为，技术创新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治本之策。下一轮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增长点是生物、能源、环保技术，中国必须突破资源环境约束以及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供应短缺的约束，成为新一轮世界技术革命的领导者之一和重要参与者，而非追随者。武汉大学周茂荣教授针对政府的4万亿元投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当前，为保增长保就业而采取的4万亿元投资措施意义重大，但同时也要注意其可能带来的负效应，如加剧中国的重工业倾向；固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主导地位，阻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重复建设造成的效率低下，易诱发新一轮通胀和银行呆坏账。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只有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外需逐步转变为主要依靠内需拉动，才能使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湖北经济学院吴少新教授作了《如何看待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信贷超高增长》的报告，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担心。他从中国信贷超高增长这一事实出发（2009年1~4月新增贷款5.2万亿元，完成全年计划104%，超经济增速98%），通过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分析得出：这一超常增长具有政治驱动、畸形化特征，存在大的隐忧，甚至有诱发通胀和蕴藏更大不良资产的后果。因此，特定时期信贷超常增长是必要的，但目前存在超高的风险，需要转变信贷增长方式。

（三）金融危机的影响

李杨教授从国际收支、外汇储备、大宗商品价格三方面详细地论述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外汇储备的规模、币种与资产选择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曼教授从金融危机中农民工返乡潮这一表象出发，深刻揭示了金融危机中企业老板、农民工、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之间的利益得失，指出了中央政府在其中的困境与无奈，“保八”战役成为中央政府应对这一两难的无奈之举。但简单地“保八”并非成为应对危机的最优选择，必须选择一个良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林建华副行长作了《对保持货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几点看法》的报告，他从银行业务实际出发，认为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当前货币政策还是很有成效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危机的三个重要特性，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以更好地应对此次危机，并提出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几点对策。

（四）对金融危机的反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宋清华教授对金融危机中金融创新进行分析，得出了两点教训和三个启示。两点教训，即金融创新不能远离实体经济；金融创新不能远离金融监管。三个启示，即成也金融，败也金融；成也金融创新，败也金融创新；成也风险管理，败也风险管理。对中国而言，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应更加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创新。华中科技大学蓝寿荣教授对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刻的法学思考，指出纯粹实体经济下制定的法律不能适应虚拟经济要求，必须进行相应的改变。湖北经济学院卢传锋副教授从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视角审视了美国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并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提出了改进的措施建议。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湖北经济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中共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梅学书副主任作了《世界金融危机对湖北的影响和对策》的报告，全面分析了危机对我省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及可能的机遇，并从扩内需、调结构、打基础、重民生等方面给出我省应对危机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对策。湖北省商务厅研究室主任唐华作了《金融危机下的湖北内外贸易形势》的报告，用具体的数据，分析了当前湖北省内外贸易的严峻形势，针对我省省情，从积极承接产业转移，调整经济结构，坚持扩大出口，坚持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引导为辅等三个方面给出湖北应对此次危机的可行性对策。湖北经济学院胡凯博士从交易费用的视角，论证了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制度优化问题，提出了降低内生、外生交易费用的策略安排。湖北经济学院孙玲博士基于2007~2008上半年湖北省外贸出口企业换汇成本的数据，测定了外贸企业能够承受的人民币汇率定价区间，从企业自身、政府、外汇管理部门、商业银行四个方面提出了湖北省外贸企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湖北经济学院唐翔博士在对湖北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特点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湖北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湖北企业审时度势形成多层次“走出去”格局的整体思路与相应战略抉择。

最后，中国社科院何德旭教授作了会议总结。认为这次务实的大会，加深了与会者对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影响的认识，为湖北省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化“危”为“机”提供了很好的决策参考。